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SINCE 189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著

张凤林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美)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7-100-08180-1

I. ①经… II. ①格…②张… III. ①经济史—欧洲—  
19世纪—文集②经济史—苏联—20世纪—文集 IV. ①  
F150.943-53②F151.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341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著  
张凤林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180-1

---

2011年6月第1版 开本880×1240 1/32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9 3/4

定价:69.00元

# 译者前言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他1904年出生于俄国的奥德萨。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于奥地利,并于1928年获得维也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领导下的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德军入侵奥地利时,他又移居到了美国。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工作了六年,任助理研究员、讲师。后又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从1948年起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直至退休。1978年去世。<sup>①</sup>

格申克龙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对19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特别是较为落后的巴尔干地区和拉丁语系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给予了全新的解说,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落后的优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劣势,

---

<sup>①</sup> 关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主要生平业绩,读者可以参阅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第55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著,《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第87-8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





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可以变成一种优势。因为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其实际的经济活动状态及发展障碍与这种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并且落后的程度越大,其紧张关系就越强,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就越大。这样,虽然在落后国家通常都缺乏甚至完全不具备先进国家(例如英国)在早先发动工业化浪潮时所拥有的“前提”条件,诸如较大规模的私人资本积累、足够容量的工业品市场等等,但是它们通过国家的干预作用或其他制度手段却可以依照各自的不同情况创造出对于这些所谓的“前提”条件的替代物,例如以政府的高积累或者投资银行来替代私人储蓄,以铁路建设等公共工程支出来弥补国内落后的农业经济对工业品需求的不足,以及通过引进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民等措施来补充本土创新的缺乏与技能型劳动供给的短缺等等。因而,落后国家便可以在与先进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发动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不仅如此,通过引进、吸收与借鉴,落后国家还可以越过先进国家以往的工业化过程的某些阶段,实行跳跃式发展。从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便呈现出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若干特点,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

格申克龙指出,<sup>①</sup>欧洲经济史的经验表明,并不存在那种统一不变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从而,先前的一些学者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原型所做出的一般理论概括(包括有关工业化发展前提的所

<sup>①</sup> 参见本书的第1章、第2章以及结束语等章节。

谓原始资本积累的概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罗斯托关于经济发展一律地遵循类似于五音阶的五个阶段的模式也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人们真的想要为考察欧洲经济发展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工具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落后程度应当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将不同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按照它们的相对落后程度依次排列,研究处于不同落后程度上的国家实行替代从而创造其自身经济发展前提条件时的特点,便可以概括出工业化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尽管它们不一定就是什么“必然性的”规律。格申克龙进而概括出六个简要命题:(1)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就越可能表现为较高的制成品增长率;(2)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就越重视企业的大规模化;(3)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品;(4)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对人民的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5)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6)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其农业就越难以为工业提供有效的市场,从而经济结构就越不平衡。当然,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也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格申克龙也承认,这种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构成了对于他的上述经济发展模型的一种限制。

除了上述理论贡献以外,格申克龙还以其对于 20 世纪前苏联



经济问题的精湛研究而称著于世。他对于前苏联经济问题的考察不仅限于经济文献资料,而且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与哲学等领域,这使他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有关研究对象的信息缺失的困难,给出许多深入透辟的分析。他在考察前苏联机器生产以及整个工业生产的数量增长时,发现工业指数编制方法的不同将会导致所计算的产出增长率的不同(这被称为“格申克龙效应”),并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统计中存在着高估产出增长率的倾向。

本书是格申克龙的一本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收录了作者有关欧洲经济史以及前苏联问题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它也是国际上在有关经济史、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并且被大量引用的经典文献。全书除导言、结束语以及三个附录以外,共分14章。其中,前八章属于对经济史的研究,作者通过对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主要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的特殊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以相对落后程度为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论框架,旨在为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在结束语中则对这一理论模式提供了一个简要总结。后面的六章属于对20世纪前苏联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由于格申克龙在很大程度上是坚持从上面所述他的经济史研究新模式的视角来审视和剖析这些问题的,故而它们与前面的各章之间在逻辑上又是浑然一体的。其中后面的三篇文章主要是通过苏维埃的文学作品来透视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而其最后的一篇文章“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注”则堪称是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格申克龙严谨的治史态



度、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卓越的理论批判与建构能力。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完成工业化和向现代化挺进的过程中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总结和吸收先进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充分地利用后发经济的优势,以便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有效的政策措施。在这方面,本书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理论界,还是实际决策部门,都将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借鉴价值。

本书的翻译工作耗时近两年。其间,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朱泱先生对于部分译文的校订意见令译者获益匪浅。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讲师(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成芳、东北财经大学商务外语学院的讲师(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兆刚与罗军、东北财经大学商务外语学院的讲师孙俐与韩兴华等人帮助译者翻译了书中大部分的俄文词汇与诗歌,和大部分的德语、法语、拉丁语词汇以及个别复杂语句的解析。译者在此谨对这些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此外,我的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张承中同学帮助解决了书中意大利语的翻译,并对部分德语、法语以及英语难句协助斟酌推敲,这也是我早期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回报。至于原书少数注释中的瑞典语和保加利亚语,除了原来附有英文译文的根据英文意思翻译过来以外,其他则没有翻译。这样处理并不影响读者对于全书内容的完整理解和把握。由于本书属于史论性文集,包含的语言种类繁多,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翻译具有一定难度,故译者虽竭尽全力,然限于能力与水平,仍难免译文中出现错误与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附注:本书的翻译属于译者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从物质资本密集型到人力资本密集型:中国若干典型产业的转型与促进就业政策研究”(07JJD630001)前期理论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对于本书的研读与翻译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与梳理,为这一项目的研究打下了较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关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准备以及有关欧洲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借鉴资料。)

张凤林

2008年3月

于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烛光园



# 目 录

致谢	1
导言	4
第 1 章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9
第 2 章 关于现代工业化的“前提”概念的反思	39
第 3 章 社会态度、企业家与经济发展	64
第 4 章 关于 1881—1913 年间意大利工业增长率的说明	89
第 5 章 罗萨里奥·罗密欧与资本原始积累	111
第 6 章 俄罗斯:1861—1958 年间经济发展的模式与 问题	147
第 7 章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中有关经济发展的 思想	183
第 7 章附录 俄罗斯经济思想中的现实主义与乌托邦: 一个评论	230
第 8 章 1878—1939 年间保加利亚工业化的某些问题	245
第 9 章 苏维埃的重工业:以美元计量的 1927 至 1937 年的产出指数	291
第 10 章 关于苏维埃俄国工业增长率的说明	315
第 11 章 苏维埃俄国的工业企业	335



第 12 章 一个被忽视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信息来源 .....	367
第 13 章 对苏维埃小说的反思 .....	395
第 14 章 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注 .....	426
结束语 研究欧洲工业化的方法 .....	444
附录 I 关于 1881—1913 年间意大利工业发展指数的 说明 .....	459
附录 II 保加利亚的工业化:基本数据与计算 .....	546
附录 III 关于计量收入与财富长期增长的一些问题 .....	566
索引 .....	580



## 致 谢

本人深深地感谢下列机构友好地允许我的论文重印于这部文集中：

1.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于“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不发达国家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霍斯里茨(B. Hoselitz)主编，1952年出版。
2. 意大利米兰的《工业》(*L'industria*)杂志对于“关于现代工业化‘前提’概念的反思”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1957年第2期。
3. 国际经济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对于“社会态度、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一书，莱昂·H.迪普里耶(Leon H. Dupriez)主编，1955年于鲁汶(Louvain)出版。
4. 《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对于“关于1881-1913年间意大利工业增长率的说明”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1955年12月号。
5. 《意大利历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Italiana*)对于“罗萨里奥·罗密欧与资本原始积累”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



LXXII 卷,1960 年第 1 期。

6. 哈佛大学出版社对于“俄罗斯:1861-1958 年间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问题”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一书,布莱克(C. Black)主编,1960 年出版。
7. 哈佛大学出版社对于“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中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俄罗斯与苏维埃思想中的连续性及其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s*)一书,西蒙斯(E. Simmons)主编,1955 年出版。
8.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对于“苏维埃的重工业:以美元计量的 1927/28 至 1937 年的产出指数”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 1955 年 5 月号。
9. 《应用经济学》(*L'Economie Appliquée*)杂志对于“关于苏维埃俄国工业增长率的说明”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 1953 年 10-12 月号。
10. 哈佛大学出版社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工业企业”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现代社会的公司》(*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一书,马松(E. S. Mason)主编,1960 年出版。
11. 《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杂志对于“一个被忽视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信息来源”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 1950 年 2 月号。
12.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对于“对苏维埃小说的反思”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 1960 年 1 月号。



13.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于“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注”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现代语言学》(*Modern Philology*)一书,1961年2月出版。
14. 国际经济学会允许将“俄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一文中的部分段落重引于本书的结束语之中。
15. 《美国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对于“关于计量收入与财富长期增长的一些问题”一文的允许,该文原载于该杂志1957年12月号。



# 导 言

本书中的论文写作并发表于 1951 至 1961 年间的各种杂志和论文集中。对原始文章的修改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关于苏维埃俄国工业增长率的说明”的那篇文章(第 10 章)是唯一一篇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改写的文章。其他论文一仍其旧,只是增加或减少了某些脚注,增加了许多细小的编辑上的变化,有一篇文章(第 6 章)最后的两小节被删除了,有关它的主题内容被转移到了另外一章。<sup>①</sup>

4

这样一种论文集面临着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风险:缺乏内在的紧密性和内容重复。它们都未能被完全避免,从而也许需要对于各篇文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给予某种简要的讨论。前面的八篇论文探讨了 19 世纪欧洲工业发展的问题。笔者关于这一主题的一般观念早在 1951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来了,该文现在成为本论文集的第 1 章。读者将会发现同样的思想在随后的几章中得到了重述,在那里它们或者成为关于这个一般主题的进一步探讨的起点(例如第 2 章的情况),或者成为对于单个国家(意大利、俄

---

<sup>①</sup> “罗萨里奥·罗密欧与资本原始积累”和“1878-1939 年保加利亚工业化的某些问题”两篇文章(第 5 章和第 8 章)最初只是以意大利文发表。“关于苏维埃俄国工业增长率的说明”这篇论文(第 10 章)最初只是以法文发表。

罗斯、保加利亚)工业化案例研究的基础。在这些论文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这样一种一般性假说:工业化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十分重要的跨地区的差异,从机能上说是与相关国家在它们工业增长的“大爆发”前夕所具有的经济落后的程度相联系的。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工业史就被视为一种统一的、然而却是渐进的模式。

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导致某种关于内部紧密性的尺度问题。此外,一组文章不是一部专著。它代表了一系列连续的探讨。因此,它关于研究过程的描述将比对其结果的描述更清楚。后者随着论文的不同将可能变化(有时是感觉不到的)。读者也许会看到,本书结尾的结束语指出了这些变化的一部分,并且讨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

后面的六篇文章讨论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问题。正如第1章所明确指出的,苏维埃的演进可以被视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的一个特例。不过,差别也是令人吃惊的,两组论文间存在的缝隙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在俄国,这一模式中的单个因素既被放大也被扭曲了,以至于达到了全然无法辨认的程度。导致这种偏离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上的”——就这个词的惯常含义而言。我们能够指出(如同第11章所述),将苏维埃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并不能增进我们对这个经济的理解。而其极高的增长率本身也不是它的特征性特点。相反,富有特征的是这一事实:它的急剧工业化的政策是由一个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所倡导和维持的,并且这种集权权力的机制逐渐支配了经济过程。由此产生了令人困惑的不一致,并且实际上阻碍了(或者至少是延缓了)人们相对于一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规范所应进





行的精神调整。

这是在“对苏维埃小说的反思”这篇文章(第13章)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因此,它不应被近似地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努力。文学方面的批评也许可以更合理地归于本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然而,读者可以考虑将“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注”这篇文章与前面的一篇论文联系起来:仅仅是由于苏维埃价值体系的特有缺陷,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在他针对集权压迫所做的勇敢的抗议中就拒绝了“物质的”进步,对于它的物质成果仅仅显示出轻蔑的态度。

尽管苏维埃的经济发展具有如此多的独特之处(*sui generis*),关于苏维埃经济的研究仍然有一些方面是与关于欧洲工业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有关增长的数量测度对于这两组论文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契合点。对此需要给予简要的解释。

由于苏维埃关于产出与收入的官方指数是不适当的,西方学者试图发展某些更令人满意的指标。笔者建立的一种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俄国重工业产品用美元表示的指标体系,就属于这些努力之一。这些各自的研究在本书第9章中得到了总结。无论它们对苏维埃的工业化过程投以何种目光,它们都相当引人入胜地揭示了指教问题在较长的时期中(特别是在急剧增长的时期)所具有的数量重要性。由于本书所给出的关于欧洲工业史的一般研究方法是针对长期变化的过程,并且也将焦点集中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所以更清楚地了解加权体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是有益的,其益处将远不限于苏维埃统计数字的范畴。

需要补充一点,一旦指数问题的重要性引起一位经济史学家

